

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Zhong Guo Jin Dai Xue Shu Ming Zhu



万国公报文选

李天纲 编校

中西書局

中国近代学术名著

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

万国公报文选

李天纲 编校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国公报文选 / 李天纲编校. — 上海: 中西书局,
2012. 8

(中国近代学术名著/钱锺书主编 朱维铮执行主编)
ISBN 978-7-5475-0283-9

I. ①万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政治思想史—中国—近代—文集 IV. ①D092.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5316 号

中国近代学术名著

万国公报文选

李天纲 编校

责任编辑 张安庆 李碧妍

特约编辑 管 华

特约编审 李国平

装帧设计 梁业礼

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(www.shwenyi.com)
中西书局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(200023)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22.25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75-0283-9/D·007

定 价 60.00 元

重版前言

朱维铮

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丛书十册，于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，为繁体字直排本。现在重版，改由上海中西书局刊行简体字横排本。*

当年由我撰写的初版编者说明，关于编纂过程，交代如下：“这套选编，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，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。编辑设想、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，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，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。”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过程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，凡十年，其中必有曲折。我的陈述没有虚语，但说得太简单，刊出后未免引出猜测和议论。

起初有种议论，以为钱锺书先生不可能同意任丛书主编。事实呢？一九八八年早春，我应邀赴北美两所大学承乏客座教席，途经香港，与正在振兴香港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业务的董秀玉总经理兼总编辑，商讨她年前的一个提议，要我主编一套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名著的丛书。她同意我用五年编成晚清编三十种的设想，随即由我以主编身份，与香港三联签订了出版第一辑十种的合同。这时董总又提出，为利于丛书在两岸三地发行，可请钱锺书先生出任丛书顾问。

没想到不久董总即告知，她专程赴京，将我起草的晚清编计划面请钱先生审阅，钱先生很感兴趣，并当场删去原拟选陈炽《庸书》一种。

我和钱先生素昧平生，此前在复旦大学曾两度受命筹办中国文化的

学术研讨会，均委托友人代邀钱先生出席，他均未莅临，而我仍将所编《中国文化》及国际讨论会文集寄请他过目。或因此，他对我稍有了解，当董秀玉女士请他担任我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丛书顾问时，竟慨然允诺。这使我很感动，虽在海外辗转数校，仍不断以函电敦请有关专家分担首辑十种的整理校点，自己也编纂较难的几种。

事情往往出乎逆料。大概在一九八八年初冬某日，董总致电给我，说是日前钱先生对记者发表谈话，内谓他已破例同意担任香港三联将出版的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“主编”。董总深感署名处理为难。我以为钱先生可能记忆偶误，却对丛书在海内外被读者接受有利；至于我的署名无所谓。问题是合同已规定主编应对编纂的稿件负责审定，并撰写每一种的学术性导言，这对年已七十八岁的钱先生可能有困难。其后商定，有关责任仍由我履行。

岂知事情的变化更出意外。我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从德国转道香港回沪，董总谓丛书校点稿排印很快，要求我即写导言，以便陆续出版。不料仅过月余，便发生那场风波，影响所及，香港三联书店也改组。新调任的总经理和总编辑，都表示承认已签合约，但对我相继交付的书稿，包括每种学术性导言，则于收到后预付合约规定的稿酬外，便搁置不予出版，理由是香港市场小，学术性书籍卖不掉。

怎么办呢？合约未改，我仍算主编，而我在学校勉强恢复教学秩序之后，除了带研究生，便全力逐篇从事导言的撰著。董秀玉女士已回北京三联书店任总经理兼总编辑。她关心丛书的出版，港方却答以等我将十篇导言交齐再议。她建议我将已改定的导言，径寄钱先生审阅。我依言寄出拟列为十种首篇的《汉学师承记》导言稿，不久即得钱先生委托杨绛先生代笔的复函，大意谓收到我的“大作”，将留下“学习”云。那信息很清楚，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与丛书编纂的关系。这使我想起他为台

湾版《钱著七种》所写的前言,内将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遭遇,称作“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”(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八版),现在是否表明他还要看一看丛书的命运呢?其时约在一九九二年夏季,钱先生已逾八十,风闻他和杨先生都身体欠安。于是我函告董总,表示不再以书稿事打搅钱先生。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一次书面通讯,当然此后也无缘识荆。

鉴于我早将十种书稿交齐,香港三联当局仍迟迟不予刊行,因而董秀玉女士遂通过购买版权,将十种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于是丛书晚清编历经八年磨难,总算提上问世日程。不知董总怎样说服了钱锺书先生,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,仍署钱锺书主编,而我则署作执行主编。奇怪的还有香港三联当局,他们以高价将丛书版权售予北京三联书店,却又附带条件,须将书版交给香港三联,另换封面印港版五百部,就是他们估算的丛书在港台的销量。我对这种“生意经”感到寒心,从此不敢和这班人打交道。

丛书出版后,有位“钱学家”写信命我提供与钱先生的交往情形。我如实答以没有直接交往。岂知此君即作长文痛骂我学识浅陋,所编丛书十种均为劣质品云云。我不得不作文说明丛书编纂实相,建议这位图书馆学者,最好不凭臆测追究他人动机。此后被人称作专写“容安馆毁人录”的这位作者,便视我为仇敌,在所谓揭秘的“大字报”中,会莫名其妙地扯上我,骂我将丛书编坏了,却又不说坏在何处,可谓深悉诬人三昧。

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丛书初版三千五百套,早已售罄。十多年来,多有朋友建议重印。钱锺书先生早已逝世。董秀玉女士也已退休多年。我于近年身罹沉疴,于是同意上海中西书局,接受李国平先生的建议,用简体字横排重版印行。

重版必须重校。好在当年参与整理点校的诸位学者,如今均成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。他们都为承担的成书的重校尽力。李国平先生还关注重版本的编辑发行。当初我撰写的十篇导言,出版后曾得读者商榷,现在除叙事数处略有修正外,余均依旧,至盼读者继续指正。

重排本署名,均依初版,以保存那段曲折历史。当然,仍须申明,全书由我设计体例,选定版本,通审校点,撰写导言,如有讹误不当,应由我负责。

2011年11月28日三改

* 其中《廬书(初刻本 重订本)》、《刘师培辛亥前文选》为繁体字横排本。

编者说明

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的晚清编,主要辑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,以期展现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异过程。

遴选的学者和论著,着眼于学说有新意,有己见,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领域,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结集则不拘一格,以专题为主,每种或收一人一书,或辑一人多篇,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。

编者对每种都做以下工作:选择底本,取原校较精的刊本;异本互勘,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;复核引文,凡原著约引节引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均出校记;重施标点,包括分段;编制索引,分人名、书名两类。

编者对每种都撰有导言,附于篇前。导言既重可读性,以助读者了解相关专题的历史实相;也重学术性,当然属于导言作者的一得之见。为行文简明,诸导言凡引证出处、考订史实或商榷疑义,均以附注形式陈述。

限于编校出版的条件,晚清编拟分辑刊行,初定每辑十种,先成先印。如可按设想出齐,当能略见系统性。

这套选编,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,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。编辑设想、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,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,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。

全编原定由两岸三地同时出版,因而版式定为繁体字直排。第一辑早已编成发排,由于种种缘故,长期不克面世。现由北京生活·读书·

新知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推出。

编者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处参预编纂的年轻同仁,感谢三联书店辛勤校勘的诸位编辑,同时期待高明指正。

编例

一、本丛书选辑十九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学说名著,每种均由编者予以校勘整理:

底本。以原刊为主,有不同版本者择善而从。

校勘。正底本排校外误,兼正原作者明显笔误,并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据正误。一般不作理校。除对校诸本择善而从者外,凡校勘改动处均出校记,以顶注形式见于同页。他校所得亦以校记出之,于正文不作改动。

节录。于篇题下注明,并于篇末注明节录出处。

标点。原刊本无标点或仅有旧式断句者,概施以新式标点。

分段。文言文论著均重分段落,以便读者。

注释。作者原注概从原刊。编者增注限于指出原著有关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显讹误,以顶注出之。

译名。中文译名及译文概从原刊。如原刊注有外文并有讹误,则由编者径予改正。为方便阅读,若干种书末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。新译名均依中国大陆出版物的通行译名。

版式。概用繁体字,直排式。除涉及语言文字学说外,凡原刊古体字异体字,均改为通行繁体字。原作或有双行夹注,现均改为单行夹注。

索引。所选诸种均增编人名、书名两种索引,以便通检。

二、本丛书所选诸种,专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参考价值者,予以保留,并移作附录。每种前均冠以导言一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导言

朱维铮

一

晚清在华的西方人士所主办的中文报刊,曾对中国的学术和政治的实际运动,发生过重要影响的,首先要数在上海出版的《万国公报》。

然而当一八六八年九月五日、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它创刊的时候,正如它最初的名义——《中国教会新报》所标识的那样,却是一份宗教刊物。

西方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,创办中文的宗教刊物,在那以前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。还在一八一五年八月,当清嘉庆二十年七月,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传教的英格兰长老会牧师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,在遭受心怀嫉妒的澳门天主教当局排挤之后,便跑到英属马来亚的马六甲,办了一份“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”的月刊,由他的助手米怜(William Milne)牧师编辑,取名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》(*Chinese Monthly Magazine*)。其中文名称虽然很怪,却被认为是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的滥觞。鸦片战争以后,欧美人获得在通商五口的居留权,而上海的租界很快成为欧美来华人员的主要基地,自然也成为新旧各派传教士的聚散中心。伦敦布道会的伟烈亚力(Alexander Wylie),首先在上海创办了中文月刊《六合丛谈》,选在清咸丰七年正月初一(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)发刊,大约在次年二月以后停刊^[1]。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下旬,英商

匹克伍德(E. Pickwood),创办了《上海新报》,初为周刊,次年改为双日刊,十年后又改为日报,随即停办。它虽是商办,却由英美三名传教士轮流主编^[2]。其中一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(Young John Allen),以后便成了《中国教会新报》的独立创办人。

《中国教会新报》虽是周刊,但每年炎夏、隆冬各休刊一周,因而年出五十卷。四年后,即由一八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二〇一卷起,更名《教会新报》。宗旨依旧,还是“传播福音”、“联络信徒”;体例依旧,也还是“教务”为主。可是,在这以前,从一八七〇年十月天津教案以清政府“委曲求全”^[3]了结之后,这份刊物便愈来愈对中国的俗世时务表示出兴趣。重新发表五年前两名英国人——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(Robert Hart)和英国驻华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(Thomas F. Wade)——向清政府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^[4],就是明证。在更称《教会新报》以后,这种薄“真”重“俗”的取向,越发明显。虽说栏目仍以“教事”为首,但篇幅却是“政事”居多^[5]。即使在“故事近闻”一栏内,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新进展的报导,也开始侵占“属灵”的篇幅^[6],用中国俗语来形容,颇有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气息。

《庄子》有言:“名者,实之宾也。”不论林乐知和刊物的主要撰稿人,同属伦敦布道会的艾约瑟(Joseph Edkins)、慕维廉(William Muirhead)等,是否比照过中国的这则古老哲理,总之在《教会新报》又出满两年一百卷之际,主编林乐知便出面宣布:从下一卷即三〇一卷起,这份周刊将再度更名,新名称是《万国公报》。

更名后续出的《万国公报》,英文取名 *Globe Magazine*,直译当作“环球杂志”。就名实关系来看,中英二名,都已脱离“教会”之实。有趣的是刊名从实了,编撰诸人的署名反而务虚了。原先的文章,作者署名都称“牧师”^[7],那是他们奉派来华的本来身份。但再更刊名之后,作者署

名却变成名不符实了。“美国进士林乐知”，“英国进士艾约瑟”，“美国进士丁韪良(William A. P. Martin)”，诸如此类，屡见不鲜。谁都知道，所谓进士，是中国科举制度下取得文官出身的特称，非经皇帝钦授不得僭用，因而与欧美的博士学位是两码事。林乐知等竟然僭用，虽然利用他们都曾充当清政府的雇员，被授予过品级顶戴这一事实^[8]，但也是利用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制度的无知。

不过，倘若撇开名实关系，从刊物编撰者的主观意向来看，则所更刊名的非宗教化，所署名衔的纯中国化，又无疑是在传递一个明白的信息，即未来的《万国公报》，将越出“宣教”的领域，更多地面向中国的公众，尤其是面向中国的士大夫。

很奇怪，林乐知在解释更名为《万国公报》的缘由的时候，只说如此一来，“既可以邀王公巨卿之赏识，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，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，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，益人实非浅鲜”^[9]。就是说，除了不读书的武夫兵痞，凡在中国能读书的各色人等都提到了，但这又使他漏举中国读书主体，所谓四民之首的士，显得越发醒目。

这一漏举，只能令人怀疑编撰者另有隐衷。《教会新报》更名《万国公报》，正值清朝的同、光之际。由于满洲宫廷政争造成的极权统治的削弱，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失败造成的帝国复兴的假象，使得被压抑二百年的汉族士大夫乘隙而起，言论空前活跃。通过科举“正途”而取得优秀文官出身的一群翰詹科道官员，便顺理成章地执掌了政论的牛耳。他们在同治末光绪初，以“清流”自命，放言高论，搏击权贵，尤其集矢于原湘军首领曾国藩、原淮军首领李鸿章两系统的军功新贵。他们尤其讨厌后者办理的“洋务”，从而对由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外交事宜的决策极为警惕，总在怀疑这班达官显宦媚外自重，能战而言和，服硬而求软，致使天朝颜面扫地。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扶持慈禧

太后实现个人独裁的清道夫,但他们的“清流”舆论,在同光之际的确起了左右全国“士”心的效应。以致凡知域外事务者,不论教育程度多高,例如同属“正途”出身的郭嵩焘、曾获法国法学博士学位的马建忠,都曾被“清流”舆论诋为“汉奸”。也许正因如此,林乐知等编撰面向中国公众的《万国公报》,唯独不敢明白昭示他们心目中主要的读者对象,其实是中国传统所指的士大夫。

更名后的《万国公报》,卷数和周期都与《教会新报》相接续,还是每年五十卷,每卷十页左右,最高十八页。出版者仍署“林华书室”,表明它其实仍是林乐知独立主办的刊物。经费来源,当由林乐知个人募集,但具体出资者,至今仍不很清楚,大概仍如《教会新报》,除林乐知个人由清政府取得的俸禄外,主要来自各国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捐助。

可得而知的,是更名《万国公报》以后,第一主要撰稿人没变,除林乐知外,还是艾约瑟、慕维廉,以及伦敦布道会派遣的韦廉臣(Alexander Williamson)、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傅兰雅(John Fryer)等。第二刊物内容在渐变,宗教性内容越来越少,世俗性内容越来越多,以致到一八七九年调整后的六类栏目中,首列政事,次列教事而外,新闻、格致、人文、杂事四类,占据了刊物的主要篇幅;关于基督教圣经的解释与宗教活动诸项报道的“教事”类,反而令人觉得可有可无。^[10]

在更名《万国公报》以后,刊物的销路渐有起色。它每季都出版合订本,因为迟钝而懒惰的清帝国各省衙门的官员,宁可订购这样的合订本,而合订本的订户,还包括日本的天皇及其内阁阁员,以及朝鲜的政府官员。^[11]遗憾的是中国的士大夫,可能并没有对这份在上海租界出版的刊物完全置之不理,但在光绪初年不信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和民间士人中间,还没有发现公开承认购阅引用《万国公报》的例证。

于是,《万国公报》惨淡经营,不间断地续出四百五十卷,也没有实

现林乐知的初始期望。出满第九年,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(清光绪九年六月廿五日)第七五〇卷内,宣布停刊。

停刊的原因,除了林乐知心有旁鹜^[12]外,还有没有别的理由,有待研究^[13]。总之,时过将近五年半,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,正值清光绪十五年的农历正月初一,它才重新出版。

那时代的中国人,缺乏敏感的时间观念,又极少留心外国人的新闻纸,对于《万国公报》的停刊又复刊,以及前后有什么区别,并不在意。因此,当它复刊以后,渐渐博得清帝国上层人物和渴求新知的年轻士子的青睐,声价日高,这时人们也以为它向来如此,并不注意它在停刊前与复刊后有何不同。

其实区别是明显的。第一是刊名,虽然中文名称依旧,但英文名称已改作 *The Review of the Time*,直译当作“时代评论”,重心在于论学论政。第二是主旨,复刊的首期便声称,它最重视的是“敦政本”,依次则是“志异闻”、“端学术”等,结语强调“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,皆在所不当遗也”^[14],——然而对于传教士来说,最为不该忽略的一点,却没有直接提及,那就是“教事”。第三是内容,属灵的直接说教,固然在版面上罕见,俗世的政治学术诸问题的相关文字,固然占据了几乎全部的篇幅,而其中居然时时出现与教义相悖的西方学说的介绍,例如达尔文主义乃至马克思学说的介绍,尤其令人诧异。第四是作者,主要的著译,固然还是出自英美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的协作;但纯由华人完成的著译,以及选载中国士人的自发的或应征的来稿,也远比停刊前多得多,这当然也是它吸引中国读者的一大原因。

更重要的不同,也许是主办者的变化。从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到《教会新报》,再到停刊前的《万国公报》,十四年间名目三变,主办者始终没变。资金筹措和编辑发行,都由林乐知独揽大权。然而在一八八九年初

复刊后,中文刊名没变,主编人也还是林乐知,而刊物却已属于广学会,由广学会投资并发行。林乐知虽然也是广学会的主要成员,但依据英美的民主习惯,他必须在刊物中贯彻广学会的总体意向。就是说,复刊后的《万国公报》,性质已起了变化,由林乐知的林华书室的独办刊物,变成了在华西方人士一派的合办刊物。

复刊后的《万国公报》,既然性质已变,则如新办刊物一样,期数也必定从头另行计算。它仍然是月刊,但每期不再称“卷”,而改称“册”,册次则连续标举。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复刊号,称第一册。终刊号为第二三七册,时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,当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。总共出版的时间,长达十八年又十一个月。假如从初更名之时算起,则《万国公报》由一八七四年九月到这时,首尾统计三十三年又三个月;略去停刊时间,实际刊行的时间,仍有二十七年又十个月。因此,海内外的中文论著,习惯称它前后存在时间有四十年左右,虽不准确,却不算过度夸张。

这二百三十七册《万国公报》,每册页数也固定为三十二页,载文合汉字约三万。版面有社说,评议政治和中外时事,译介西方政论及伦理等学说,包括上谕和臣工奏折的摘录,以及各国新闻和电报辑要。主要撰稿人,除林乐知外,西人有慕维廉、花之安(或作化之安,Ernst Faber)、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、李佳白(Gilbert Reid)等。助编及撰稿的华人,有沈毓桂、蔡尔康、范祎、袁康、任廷旭等。

二

林乐知无疑是《万国公报》的核心人物。

这位美国牧师,一八三六年一月三日生于佐治亚州。一八五八年在

本州的埃默里学院(Emory College)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后,便与新婚妻子决定献身海外传教事业^[15],加入了美国的南监理会。一八六〇年七月,他偕妻女和同会教士华美德(M. L. Wood)抵达上海。那时他才二十四岁,直到一九〇七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病逝,享年七十一岁,居留中国的时间将近四十七年。

按照差会的要求,林乐知入华后,应往杭州拓殖教务。他去了,却发现这座城市没法立足,因为它已被太平军与清军的争夺战所摧破。他只得折返上海,然而上海也在李秀成的大军围困之中。那时英美传教士纷纷前往太平天国的占领区访问。林乐知也曾前往天京,受到干王洪仁玕的友善接待。但林乐知事后以为,他在中国的第一课程,仍然是等待和忍耐^[16],就是说要在中国开展传教事业,还是在中国的内战中取观望态度比较稳妥。

然而林乐知入华仅九个月,美国便发生南北战争,一打就是四年。蓄奴的佐治亚州参与了反叛,也化作战场。在华的监理会教士人数虽少,但失去来自本国教区的经济支持,生计大窘,传教更难。林乐知、华美德进退维谷,只得到处打工,藉以谋生。林乐知就贩卖过粮食煤炭,替洋行当过跑街——收购棉花或推销保险,为外国使领馆做过译员。^[17]这类生涯,对他的汉语能力提高和社会经验充实,很有益处,同时也结识了不少中国人士。

一八六四年三月,由上海同文馆(后改称广方言馆)的首任监院冯桂芬推荐,林乐知受兼任同文馆监督的护上海道应宝时聘请,入馆任英文教习,但数月后即被新任署上海道丁日昌解聘,显然丁日昌要以这个位置安插他的幕友黄胜。^[18]一八六七年黄胜辞职,已经升任上海道的应宝时,又重聘林乐知担任此职。^[19]他教授得法,不仅重视语言训练,还结合课文传授西方科技知识,包括在课堂演示实物模型及带学生参观